



全球化译丛·全球化与自主性

Empires and Autonomy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加拿大〕斯蒂芬·斯特里特 〔加拿大〕约翰·韦弗 〔加拿大〕威廉·科尔曼/主编
陈家刚 等/译

Stephen M. Streeter, John C. Weaver, William D. Coleman

帝国与自主性

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时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与自主性: 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时刻 / (加) 斯特里特 (Streeter, S. M.), (加) 韦弗 (Weaver, J. C.), (加) 科尔曼 (Coleman, W. D.) 主编; 陈家刚等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2

(全球化译丛·全球化与自主性)

ISBN 978 - 7 - 5097 - 1727 - 1

I ①帝… II ①斯… ②韦… ③科… ④陈… III ①国际化 - 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3675 号

· 全球化译丛 · 全球化与自主性 ·

帝国与自主性

——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时刻

主 编 / [加拿大] 斯蒂芬·斯特里特
、 [加拿大] 约翰·韦弗
译 者 / [加拿大] 威廉·科尔曼
译 者 / 陈家刚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 娟
责任校对 / 王静连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3.4 字数 / 20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727 - 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0 - 693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全球化译丛》总序

1998年我主编了国内第一套《全球化论丛》，距今已经十年整。这十年是中国与世界天翻地覆的十年，而造成这种巨大变迁的根本动因之一，便是全球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特征。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全球化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领域。在推动国内学术界的全球化研究方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功勋卓著。在过去的十年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既译介了大量国外学者的全球化研究文献，又出版了众多中国学者的全球化专著论文。经过不懈的努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全球化”系列，不仅成为该社的一个品牌产品，也成为中国学界全球化研究水准的一杆标尺。

出版社决定进一步整合旗下的各种全球化翻译作品，推出新的《全球化译丛》，谢寿光社长嘱我再为译丛作一个总的序言。作为国内全球化研究的首倡者之一，我责无旁贷。其实，我已经为各种全球化译丛或论丛写过好几篇序言。适应当时国内全球化研究现状的需要，在那些序言中我反复表达的意思是：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个人类历史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既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和“资本主义化”，它是一种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害怕与否，它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与世界的



命运。唯有深入研究全球化的规律，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掌握全球化的主动权。现在，上述这些观点几成共识，无须再强调。尤其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不仅深度介入全球化进程，而且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化赢家之一。

那么，在这里再说点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造成深刻的冲击。换言之，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和学术现象，正在重塑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学术研究，改变我们的思维所赖以参照的坐标系，要求我们同时具有民族性和全球性的双向思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展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术，并使之走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魅力和实力。

长期以来，建立在领土疆界之上的民族国家一直是我们进行想象和分析的基本依托和主要坐标，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无情地撼动民族国家的传统疆域。毫无疑问，在可见的将来，民族国家仍将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仍将是基本的政治身份标志。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受到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全球化是一种穿越国界的过程，全球性是人类对民族性的一种超越。它既要求我们进行民族的思考，也要求我们学会全球的分析。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进行比较分析的主要坐标，但全球社会也同样应当是比较研究的基本参照。

因此，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必须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既使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扎根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同时又不背离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和普遍原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具有超越国家的普遍性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我们的学术研究应当在立

足中国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应当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认识到，中国的学术智慧是全人类学术智慧的重要内容。

全球化要求我们特别重视前瞻性思维和理论创新。习惯于逆性思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言必称三王，行必提尧舜，理想的时代必定在古代。即使欲对传统有所突破，也要“托古改制”。带着沉重的怀古情结来观察和评判现实，一看到或听到新的观点和理论，往往不是冷静地分析，而是根据既定的标准进行指摘和抵触，这是我们的传统思维定式。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伸，是对传统的超越，无情地摧毁了过去的各种理想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过去的和现存的每一种社会生活模式都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它迫使人们进行前瞻性的思考，把理想模式建立在未来，而不再是过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

全球化要求我们在进行纵向思维的同时，特别重视横向的比较思维。纵向思维使我们能够学习历史的经验，但片面的纵向思维容易把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历史经验中，总是拿自己过去的经验与现实进行比较，觉得自己现在是如何之好或如何之坏，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对现实的虚假满足或极度憎恶，不是夜郎自大，就是自暴自弃。前者使人看不到自己与别人事实上存在的差距，后者则使人看不到自己身上具有的优势和长处。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跨国性，它迫使人们更多地进行横向思维，即跳出自己狭隘的历史经验，将自己的经验与别人的经验加以比较，虚心向其他先进者学习，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既不夜郎自大，沾沾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又不妄自菲薄，看到与先进者的差距就垂头丧气。

全球化要求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进行综合的思考。简单的两分法思维方式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其特征是把两种事物截然对立起来，似乎有他无我，有我无他。首先不问观点是否正确，事物本身是否对人民有益，而是一上来就问姓



“资”还是姓“社”，姓“中”还是姓“西”，是“马”还是“非马”。全球化既不是单纯的同质化，也不是简单的碎裂化，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既是民族化，又是世界化；既是分散，又是整合。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的“对立统一”，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其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既不符合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更会给现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全球化正在摧毁目的论和宿命论的现实基础，要求我们具有过程性的思维。一切宗教和神学的哲学基础都是目的论和宿命论，它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假定一切事物、一切行动都有其终极目的，人们无法超越预先设定的最终目的。一切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归根结底也是由这种宿命论和目的论派生出来的，它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在封闭的环境中长时期地静止不变。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必须对外部世界开放，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全球化不是一种目标，甚至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它迫使民族国家不断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进行创新，使改革和创新也变成一个持续的过程。

总之，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生活，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正如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不等于“东方化”一样。我们正在全力振兴中华文化，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复兴。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迎接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更加积极地进行文化创新，更加充分地吸取人类文明一切合理的成果。这是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俞可平

2008年劳动节于京郊方圆阁

《全球化与自主性》丛书中文版将要和中国学者、学生和公众见面了，对此，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深感荣幸。全套丛书都围绕着以下这样一个核心假设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展开：全球化的复杂进程与同样复杂的“自主性”所蕴涵的能力和 value 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我们的研究团队对“全球化”采取了一种宽泛的理解，摒弃了那种仅仅关注经济进程的狭隘视角。如果全球化意味着跨越全球的联系和关系的增长（有些以超领土的形式出现），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联系可能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以及军事的。同过去相比，某些超领土的关系和联系，更少受制于个体生活于其内的社区和民族国家的物质性的领土疆界。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研究的范围就扩大到以下这些领域：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某些音乐形式在全球范围的风靡（比如中国的钢琴王子郎朗）；中国人在向其他国家移民的同时，保持其与母国家家庭和朋友的联系；经济动荡从纽约交易所蔓延到每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温室气体从世界的一个角落“流向”另一个角落，改变着世界的气候状况；以及举办全球性的文化盛会（比如中国在 2008 年举办了奥运会）。

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全球联系的增长，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生活在这些国家中的人群产生了影响。在研究中，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某些最重要的影响是否与我们所说的“自主性”相



关。“自主性”这个词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社会文化准则中拥有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能力”，即个体和社会能够做的事情；也可以指“价值”，即在个体和社会生活中，哪些是更为重要的，哪些是不太重要的。

当我们视“自主”为“能力”时，我们认为它或许指的是单个个体或者是个体的集合。如是则“集体自主”意味着国家（比如中国）拥有管理自己的能力，或者用联合国的用语，国家拥有“自决权”。一国管理自身的能力越强，则它享有的集体自主性便越高。当我们论及集体自主时，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政治，还包括一国的经济，或者国家的文化活动，或者国家对文化生产的控制等。我们也清楚，集体自主的不同维度通过多种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以与美国共处北美大陆的加拿大为例，它同时面临着文化自主和经济自主弱化的问题。但这种情况在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就未必会发生。在土耳其，政治家们愿意为了成为欧盟的成员而放弃一些经济上的自主性，但是他们相信土耳其的文化不会因此受到威胁。与此相似，在向“全球化与自主性”研究团队所作的报告中，俞可平教授——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强调指出，参与全球经济而必须放弃一些集体的经济自主性，这是否会对政治自主性产生影响，中国学者就这一问题也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全球化与自主性”研究团队并没有将对“集体自主”的讨论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相反，他们也关注一些地区层面的社区，以及存在于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全球性组织。当代的通信和信息技术使得自治性的全球数字社区（digital communities）的出现和成功运转成为可能，而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除此之外，民族国家中一些文化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或许会要求更高水平的自治，典型的例子包括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英国的苏格兰、印度的克什米尔、印尼的东帝汶以及生活在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等。当今的全球化促使少数民族提出更多的“集体自治”要求，

我们的研究团队试图发现这种要求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

在研究中，我们用“个体自主”（individual autonomy）来指单个个体的能力。个体获得基于其“自然”品性的完全自由，这种观念源于对欧洲中世纪压制性体制的唾弃。后来，它发展为要求个体（最初是拥有财产的男性）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有权决定自己的信仰，以及有权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研究中，我们也考虑到以下事实，即“自主”的观念源于欧美文化和价值，并且它经常反映的只是父权结构的社会状况。女权主义者认为，以往讨论的“个体自主”反映了独断专行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他们同时指出，这种“个体自主”观念同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一些人倡导关系型自主（relational autonomy）概念，即基于个体社会关系之上的自主。

对上述这些概念的讨论表明，“自主”不仅意味着能力，而且还意味着价值。“集体自主”概念的核心是自决或自治。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先前诸世纪中存在的帝国的瓦解以及越来越多的领土逐渐为民族国家所控制，这种价值也被全球化了。然而，全球化进程导致的各种问题的出现（比如金融市场的无序、危险疾病的迅速蔓延以及全球气候变暖），使得这种价值（即集体自主）日益为人所质疑。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将其自主权转交给国际组织。

同样，个人主义——它是个体自主理念的核心——也为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所诟病。一些人认为，个人主义和社群（community）的理念应当并重，人们应该学会如何一起生活和工作。还有一些人强调团结。他们认为，在面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挑战时，社会成员需要相互帮助，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一些学者认为，个体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的提高，可能会削弱社群的根基以及人们之间的团结。

因此，这项致力于全球化与自主性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是综合性的。迄今为止，它已进行了将近七年的时间。最后，我们决定按



照主题来阐述我们的发现，这些主题包括：全球秩序、社群的重新界定、帝国与帝国主义、合法性危机、本地人的看法（the ins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文化自主、产权以及环地中海地区（作为体现富国和穷国之间关系的一个案例）。在将本项研究的成果献给中国读者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借此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对全球化与自主性问题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因此，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仅仅是第一步。我们希望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学者能够以严肃认真的批判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研究成果。世界各国学者之间的对话应当会大大加深我们对全球化和自主性相互关系的理解，我们尤其期待着能与中国学者进行积极的对话。

正是由于俞可平教授的参与，才使得出版《全球化与自主性》丛书的中文版成为可能。俞教授在 2004 年参与了项目的第三次会议，并且为我们的研究团队带来了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理解。正是在那个时候，俞教授与我约定，一旦项目的研究成果通过了专家审议并且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便启动丛书中文版的翻译工作。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社长彼得·米罗伊（Peter Milroy）先生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了丛书的翻译计划，对此，我深表感谢。我也要感谢俞可平教授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和帮助，正是因为有了他的不懈努力，丛书的中文版才能与中国读者见面。

威廉·D. 科尔曼

“全球化与自主性”研究项目负责人

前言 当代世界中的辩证关系

《全球化与自主性》丛书为跨学科研究项目“大型合作研究倡议”(MCRI)集大成之作。该项目的资助者为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HRC)。后者启动这一项目,其目的是为那些需要不同大学 and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通力合作方能达成研究目标的大型工程提供通道。“大型合作研究倡议”对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自主性(autonomy)的研究始于2002年4月。参加研究团队的学者中有40位来自加拿大的12所大学,其余20人则来自加拿大之外,包括澳大利亚、巴西、中国、丹麦、法国、德国、斯洛文尼亚、中国台湾、英国和美国。

在获得“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的额外资助之后,“大型合作研究倡议”项目开始与另一个由28名学者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团队携手合作,这个研究团队即“地中海问题跨学科研究小组”(GERIM)。“地中海问题跨学科研究小组”的基地在突尼斯,其成员分别来自法国、西班牙、约旦和黎巴嫩。如此一来,“大型合作研究倡议”项目就囊括了如下学科的学者:人类学、比较文学、文化理论学、经济学、英语文学、地理学、历史学、音乐理论、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大型合作研究倡议”项目从构思、设计到实施,一直遵循跨学科研究的原则。我们尽力把不同学科的理论 and 概念框架放到一起对话,以便激发出新的理论 and 对人类社会的新的理解。研究工作要



这样进行，有四个条件是必须满足的。首先，我们必须在不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规范（disciplines）之间建构起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融合形成的观点又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为达成这一融合，我们的团队经过吸收有关全球化和自主性的现有研究成果，最终在一系列核心研究目标上达成了共识。为了把这些目标论述清楚，成员们挖掘出了许多待议问题，并制订了一项足以用一种集中系统的方式把这些问题论述清楚的研究计划。其次，必须鼓励团队成员既要在本学科内部做到深入全面，又要在不同学科之间根据知识建构的需要做到海纳百川。再次，必须选择一批能够保证研究按照不同方法进行下去的团队成员。最后，面对有关全球化当中所涉及的复杂关系的研究任务，要走一条跨学科的道路，我们的工作就必须是多元理论视角（pluri-theoretical）的。我们秉持这样的观点，即一种理论要想最具有有效性，除了概念的应用要严谨之外，它的提倡者还必须既勇于承认任何特殊的理论观点都有其局限性，又敢于自觉地越出雷池并采用别人有时乍看之下不敢苟同的观点。

为了从一开始就保证学术上的一致性，成员们在第一次项目组全体会议上就在上述方法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一以贯之地追寻以下核心目标：考察全球化与确保、构筑自主性的过程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竭力从各种全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两个概念，理解它们各自内在的历史演变过程，尽管它们两个在内容、含义和外表征方面各不相同。

鉴于全球化这一术语近来被用于描述当前时期，我们试图：

（1）辨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机遇，以及全球化可能给那些力图确保、构筑自主性的个人和团体带来的局限；

（2）弄清楚个人和团体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这些机遇并克服这些局限；

（3）弄清楚全球化能够为力图确保、构筑自主性的个人和团体带来多少赋权的机会；

（4）指明个人和团体获得的自主性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对抗、

重塑或参与全球化。

为了把项目的核心目标说清楚，我们沿着三个相互交织的方向展开我们的研究。首先，我们承认全球化和自主性均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在许多方面都是往日的延续。因此，当前对全球化和自主性的考察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弄清楚何者为新，何者已发生了变故。其次，全球化和自主性的关系的变化，是与权力和权威的场所的一系列变化密不可分的。最后，全球化和自主性的关系的变化，是在建构和重构作为团体之本质和价值的认同的过程中，在自主性通过文化和各种零散的制度而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拉开帷幕的。在这三个研究方向，我们均形成了一支团队，并且各团队都认可并同意回答那些核心的问题，以便为研究确定清晰的方向。有关那些核心问题的完整表述，请登录 <http://globalization.mcmaster.ca/ga/ga81.htm>。

经过项目小组连续几次年度会议讨论，我们的研究逐渐集中到下面这些主题：制度与全球秩序，民主与合法性，全球化和自主性在历史中的连续性和断裂，历史、知识产权与资本主义，共同体，文化以及土著居民的现状和斗争，作为南北关系缩影的地中海地区。参加这些主题研究的学者们均来自不同学科，从而使得每一个主题的研究队伍均可以开展内部的学科间对话。主题因此而转变成单个的研究问题，并通过一系列著作来对问题进行分析。尽管这些著作采取了纸质出版的形式，但项目小组也开发了一种网络出版物，即“全球化和自主性在线纲要”（Globalization and Autonomy Online Compendium），从而使普通民众也能经由研究综述，关键概念、组织、民族、事件和场所的术语表，以及一份全面综合的参考书目，了解到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所有这些出版物的最终目的，是打造一部统一的研究文集，全面深入地梳理全球化和自主性之间的变动不居的关系。



国与自主性

目录

CONTENTS

前言 当代世界中的辩证关系·····	1
第一章 导言 ····· 威廉·科尔曼 斯蒂芬·斯特里特 约翰·韦弗 / 1	
第二章 资本的国际化：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 萨米尔·索尔 / 28	
第三章 全球工业飞地：公司城与出口加工区的世纪 比较（1900~2000）····· 尼尔·怀特 / 60	
第四章 无线电广播的自由，抑或电磁公有物？20 世纪 20 年代的全球性、公共利益和无线电多边谈判 ····· 丹尼尔·格尔曼 / 89	
第五章 范式转换与纽伦堡审判：作为国际法主体与 目标的个体 ····· 阿德里安·琼斯 / 109	
第六章 全球化时刻：联合国十年发展规划和北非国家 ····· 亚辛·埃斯德 / 133	
第七章 彩虹蛇：土著居民的世界观与自主性的构建 ····· 莱韦·科斯塔 / 158	
第八章 全球化与美国帝国：全球性转折的关键时刻 ····· 乌尔夫·赫德托夫特 / 175	
缩略词·····	211
参考文献·····	217
作者简介·····	250

第一章 导言

威廉·科尔曼 斯蒂芬·斯特里特

约翰·韦弗

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一种似乎预示着现代全球化概念的方式描述了19世纪中叶的欧洲：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①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 Robert Tuck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476-477.

大约 150 年后，基于其对当前经济情势的观察，以及关于 1870 ~ 1914 年那个时代的回顾和反思，已故的保罗·赫斯特与其合作者格雷厄姆·汤普森指出：“不管人们希望怎样描述它，当代民族经济的融合、相互依存，以及开放的程度都不是史无前例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低估当今的融合程度，或者说忽视由它所引发的规制与管理问题，我们仅仅想表达一种怀疑，即人类的经济活动国际化是否已经跨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①

在赫斯特和汤普森提出这个观点的两年后，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英国广播电台（BBC）的里斯讲座——通过广播电台在世界范围内播放——作了一次演讲。他将那些围绕全球化这一新事物展开争论的人分为两大阵营：怀疑论者，如赫斯特和汤普森；激进论者，这些人相信全球化不仅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而且是革命性的。虽然他支持激进的立场，但紧接着他又指出，这两大阵营“都几乎将全球化看成是经济现象。这是一种误解。全球化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技术和文化的。影响全球化的最主要因素来自各种通信体制的发展，这一点可以回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②。总之，在 150 年后的全球化的怀疑论者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年描述的革命性变革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对于激进论者而言，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一系列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叶所观察到的复杂变化中，被彻底地革命化了。

为了实现“全球化与自主性”这一跨学科研究项目的伟大抱负，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都需要认真考虑他们的研究怎样才能回答源自上述争论的一个或者更多的历史性问题：

1. 全球化与自主性的历史根源是什么？过去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和差异在哪里？

① Paul Q.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60.

②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8.

2. 政治权威（地方的、国家的和全球的）获得的资本支持怎样为全球化的扩张和渗透创造了新的机会？资本对上述因素的支持在何种程度可以让我们谈论全球化时刻？^①

3.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最近突发的、决定性的全球化时刻，那么，当前时刻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当前时刻的深厚基础是什么？全球性的基础又是什么？

4. 自主性的概念和实践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化？这些变化与阶级、公民资格和认同有着怎样的联系？社会和历史记忆怎样影响阶级、认同，公民资格和自主性？

5.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全球化与全球性是怎样并以何种方式进行争论的？在这些特殊的历史时刻，自主性怎样促进或阻碍全球化与全球性之间的争论？在何种程度上，全球化与全球性之间的争论变成了支持或反对自主性的斗争？

6. 我们的研究是怎样将全球化与自主性同帝国主义和帝国联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全球化的不同时刻，这些联系和这些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连续性、非连续性与核心概念

我们相信，在思考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时，将“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加以区分是最为重要的。国际化是国家间的相互交往与相互依存的发展。^② 这些国家的政府将这些交往和社会关系组织成一个单位（unit）。这些各不相同的“国家”共同体构成了被治理的对象。与此不同的是，全球化意味着“人民之间的联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在最近的

① William D. Coleman and John C. Weaver, eds., *Property Rights: Struggles over Autonomy in a Global Age* (Vancouver: UBC Press, forthcoming).

② Jan Aart 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rev.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54.